

人性話語的守望與自救

——論劉小楓《詩化哲學》

李書晴*

摘要：《詩化哲學》作為劉小楓學術生涯的正式起點，奠定了他推崇浪漫主義的學術基調。在此後的研究中，劉小楓既延展這一特色又經歷了觀念的轉變，讓它成為批判和更新對象。該著的意義與劉小楓後來的思想調適，呈現了他對生命意義多面向的肯定和深化，見證著這一代知識份子直面挑戰、勇於承擔的風範和在堅守中自我革新的學術使命。

關鍵詞：劉小楓 《詩化哲學》 學術思想

一、引言

「本書的目的有限，這就是：認識德意志的浪漫主義傳統。」^①劉小楓認為，隨著現代文明的出現，人的生存意義受到極大挑戰，浪漫主義學者們的神經被觸動，他們執著地在工具理性的統治下尋找人性的根本價值、靈魂的來處和歸處。《詩化哲學》從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的自我學說開始，途經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諾瓦利斯（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 1772-1801）等十幾位哲學家，又重點認識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等六人，最後終於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社會批判的本體論。在此途中，劉小楓希望通過個體的超越性生成使生命進入到一個有意義的世界，解決有限與無限的普遍分裂問題，從而彰顯人性的意義。

《詩化哲學》是劉小楓學術生涯的正式起點，但學界對其長期意義和重要性的揭示

* 李書晴，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① 劉小楓：《詩化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

尚不足夠，多是將《詩化哲學》作為《拯救與逍遙》的對比進行分析，並未深入《詩化哲學》的獨立價值與長期影響。如蔣虹的碩士論文〈論劉小楓早期美學思考與轉向——從《詩化哲學》到《拯救與逍遙》〉^②、翟崇光的〈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詩化美學」解讀〉^③和陳月瑤的〈生存本體論的困境——反思劉小楓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學思想〉^④，此三文都肯定了《詩化哲學》在劉小楓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點出了《詩化哲學》對劉小楓思想轉向的作用，但未關注到此書在劉小楓長期整體學術思想中的影響。姚新勇、翟崇光的〈劉小楓學術轉向批判〉^⑤梳理了劉小楓思想的幾次轉向，對轉向原因有所分析，但對《詩化哲學》的潛在影響探究不足。對劉小楓思想及其另外著作的研究不少，向天淵^⑥、陳思銘^⑦和張海濤^⑧等人從詩學方法、個體思想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劉小楓思想的個人特徵，夏中義^⑨、劉洪霞^⑩和趙良杰^⑪等人討論了《拯救與逍遙》的價值立場、影響程度，然而都集中在單個問題或單部作品的專題討論上，沒有串聯劉小楓的學術思想整體分析，也未關注到《詩化哲學》的長期作用。

整體來說，《詩化哲學》是劉小楓重要的學術起點，儘管他的思想方向在後來有幾次變化和轉移，但《詩化哲學》奠定了劉小楓精神世界中推崇浪漫主義的學術基調，是他學術思想的底色，該著其後又成為他批判和更新的對象，在反覆和矛盾中纏繞著他

-
- ② 蔣虹：〈論劉小楓早期美學思考與轉向——從《詩化哲學》到《拯救與逍遙》〉（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③ 翟崇光：〈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詩化美學」解讀〉，《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年11月），頁65-70。
- ④ 陳月瑤：〈生存本體論的困境——反思劉小楓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學思想〉，《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2021年3月），頁69-74。
- ⑤ 姚新勇、翟崇光：〈劉小楓學術轉向批判〉，《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2期（2017年4月），頁37-43。
- ⑥ 向天淵：〈中西精神衝突的正解與誤解——劉小楓比較詩學的思想與方法〉，《東方叢刊》2009年第3期（2009年10月），頁155-165。
- ⑦ 陳思銘：〈論劉小楓心靈中的個體思想〉（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⑧ 張海濤、李貝爾：〈文明衝突與劉小楓的「絕對價值論」立場〉，《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2019年4月），頁69-73。
- ⑨ 夏中義：〈民族精神系譜的個案追問——論劉小楓《拯救與逍遙》〉，《浙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1996年9月），頁95-103。
- ⑩ 劉洪霞：〈「拯救」八十年代知識立場的使命——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於八十年代的意義〉，《當代文壇》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46-50。
- ⑪ 趙良杰：〈價值現象學的迷失——評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的思想視野〉，《文藝研究》2014年第9期（2014年9月），頁150-160。

四十年的學術生涯，始終影響著他的學術思想和價值態度。但學界目前對《詩化哲學》重要性的揭示仍不足夠，且並未將此著放到劉小楓整個學術歷程中來探究其地位。因此，幾十年後，《詩化哲學》的影響有必要被重新認識，要看到這部著作在劉小楓學術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二、詩意下的理想抗爭

劉小楓在《詩化哲學》中多次強調西方浪漫主義興起的背景：當技術文明和自然科學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處時，人的靈性、人的價值、人的思維都被如洪水猛獸般襲來的科技文明強勢地淹沒了。因此，浪漫主義學者們開始重新尋找人類丟失的生活意義。劉小楓認為，《詩化哲學》著重探討的浪漫哲學的旨趣就在於：「在這白日朗照、黑夜漫漫的世界中，終有一死的人究竟從何而來，又要去往何處，為何去往？有限的生命究竟如何尋得超越，又在哪里尋得靈魂的皈依？」^⑫浪漫主義急需回答的問題是，淺薄的生命如何才能獲得獨屬於人的意義，用以對抗虛無蒼白的生活？《詩化哲學》給出的答案正是詩化。關於「詩化」的含義，劉小楓認為，「生命（生活）的詩化，指通過詩的活動穿透生活晦暗不明的現象，揭示出超驗的意義」，^⑬即通過個體的超越性生成來使生命從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進入到有意義的世界，從而彰顯人生的價值。正如李慶本所說：「在劉小楓那裏，詩不是一種藝術形式，而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重要依據，詩化哲學的終極問題是人生的詩化，使有限的生命尋得自己的皈依。」^⑭在《詩化哲學》中，劉小楓將作為學科分支的美學上升到面對人生終極問題的層次，極大地提升了美學的價值。從《詩化哲學》開始，劉小楓就想探討人和世界的本質關係，以及人應當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這虛無的世界，他的思想基礎由此就被確定下來。

《詩化哲學》表現著一位初探社會的青年學者所進行的理想抗爭。從《詩化哲學》到《拯救與逍遙》，劉小楓想追尋的根本問題是一致的，即「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應該是什麼；世界的命運亦即在這個世界中，我和我的同類的命運應該是怎樣的。」^⑮縱觀劉小楓的論著，於前者，虛無和荒誕是不變的運行本質；於後者，絕望和死亡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劉小楓的理論底色如此悲情，與他在時代風雲下的動盪生平有極大關係。對劉小楓自稱的「四五」一代來說，「這一代人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理想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⑯在他們生長的途中，理想主義是十分熟悉的旗幟，「然而，這代人起初並

^⑫ 劉小楓：《詩化哲學》，頁9。

^⑬ 劉小楓：《詩化哲學》，頁211。

^⑭ 李慶本：〈從詩化哲學到詩性美學〉，《獨秀論叢》2021年第1期（2021年6月），頁90-95。

^⑮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75。

^⑯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頁13。

沒有想到，理想主義竟然也會有真偽之別」。¹⁷如果說，青年時期的劉小楓已掀開「偽理性主義」蒙蔽他雙眼的黑布，那「真理想主義」又該是怎樣的？1985年，劉小楓從北京大學畢業，他的碩士論文即是《詩化哲學》的雛形，在他讀書期間，哲學領域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美學熱」逐漸興起。1979年，朱光潛發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¹⁸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討論隨之展開，李澤厚、高爾泰等學者也紛紛從美學角度肯定人的價值，主張文學應表現人性。但1980年代前期的「人」的觀念存在種種局限，在政治因素的干擾下，人的社會屬性被過度偏重，個體的重要性依然受到漠視。因此，劉小楓敏感的心靈被更深地觸動，他身處「美學熱」的氛圍中，卻無法認同和跟隨主流的學術思考，他要努力跳出當時話語的窠臼，《詩化哲學》便承載起他這態度，大力表達個體的迷茫和困惑，強調肩負時代砂礫前行的普通個人的痛苦。在餘溫尚未散盡的時代，當虛幻浮誇的龐大價值褪去後，對個體感受的關懷得到重視，對劉小楓來說，「理想主義已更多地成為精神品性，而不是意義話語。這種品性意味著，不管這個世界如何無聊、讓人沮喪，畢竟仍有美好的、值得珍惜的、為之感動的東西存在」。¹⁹劉小楓靈魂中的理想主義特質在《詩化哲學》中得到了鮮明體現，在人人迷茫的氛圍中，他選擇了美學作為他當時的生存支點。《詩化哲學》對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的觀點進行了重點論述，劉小楓在這部分傾注了不少個人情緒，不厭其煩地借里爾克等哲人的思想來強調愛的價值。在曾經的信仰被顛覆的時刻，失措的人們需要一點信心來支撐空虛的精神，劉小楓注意到了這一點，「詩化」的其中一層含義便是以詩的情感來給予寒冷世界中的人一點溫愛，「對有限生命來說，只有愛能夠給他永恆的自由，給予他無限的意義」。²⁰

劉小楓的理想主義既表現為他對永恆虛無的抗爭，也體現在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求變上，後者借他語言的詩化得以表達。在思想湧動的80年代，關於「純文學」的討論已逐漸展開，「而80年代後期在美學、文學理論、文學史領域依靠構造新的知識譜系而進行的專業化研究取向，事實上也可以看作是『純文學』確立自身地位的具體歷史表徵」，²¹以甘陽、劉小楓為代表的「文化叢書派」是這討論中影響極大的一脈，於他們而言，要「構造新的知識譜系」，既要重點利用、轉化西方文論的成果，也要在語言上

¹⁷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頁13-14。

¹⁸ 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文藝研究》1979年第3期（1979年6月），頁39-42。

¹⁹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頁256。

²⁰ 劉小楓：《詩化哲學》，頁261。

²¹ 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2007年2月），頁29-41+46。

對體制化主流的話語進行衝擊。劉小楓師從宗白華，「可謂是繼承了其老師中國傳統文人式詩化表述的方式」，^{②②}他優美詩意的語言與宗白華關聯緊密。「美」就是劉小楓文字的最大特點，他的論述充滿了情緒化的個人表達，正如翟崇光所認為的：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掙脫文化制度」的詩化寫作具有「反叛性」，他的詩化語言是對「社論」語式（「文革」時期極左、教條、單一式語言）的反叛。^{②③}劉小楓以文學化的語言反叛政治化的表述，實質是他抗爭社會集體思想的方式。語言的革新也在他後續的《沉重的肉身》中得以繼承，他用小品文的體裁重新講述歷史故事，個人幻想下對故事的重組遠遠多於對史實本身的依從，如將畢希納（Georg Büchner, 1813-1837）的死亡與他創作《丹東之死》聯繫起來，說畢希納死於「一場因看到近代自然權利的自由倫理的底蘊而引發的傷寒」。^{②④}畢希納的研究者李士勳對此表達不滿：「事實是，畢希納之死與他寫作《丹東之死》沒有關係」，^{②⑤}甚至說劉小楓如此創作對人有害無益。於文體創新的原因，劉小楓早在《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的自序中就有過回答：「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體；二，摸索切合自己關心的各種思想學術論題的不同文體」。^{②⑥}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提到劉小楓的文學化語言，甘陽的回應是：「這個和更早時候的美學熱還不太一樣，美學熱實際上比較早想走入一種美學專業化的研究，小楓這裏有一種更靈性追求的一個東西。」^{②⑦}這裏的「靈性」一方面指劉小楓的詩意語言，一方面指他跳脫出美學學科體系建設的討論語境，真正關注到主體審美和生存的自由，有學者評價道：「劉小楓對哲學和文學詩意的關照和關懷以及『審美感性論』的張揚等等，逐步將美學進一步統一到主體自由的感性生成之上，成為一種尋求心靈對話和靈魂敞亮的活動」，^{②⑧}認為「至此，『美學熱』完成了歷史的演進過程，並最終和人道主義思潮共同彙集到了『主體自由』的關鍵點上」，^{②⑨}對劉小楓給予了充分肯定。可見，通過主題的革新和語言的美化，劉小楓有意突破傳統和主流風格的限制，《詩化哲學》將美學上升到討論人生終極價值的維度，這是他理想抗爭中的關鍵一環，也是他實踐自我理想主義的重要

^{②②} 翟崇光：〈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詩化美學」解讀〉，頁65-70。

^{②③} 翟崇光：〈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詩化美學」解讀〉，頁65-70。

^{②④}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頁44。

^{②⑤} 李士勳：〈質疑劉小楓博士的《沉重的肉身·丹東與妓女》〉，《東方論壇》2010年第6期（2010年12月），頁63-72。

^{②⑥} 劉小楓：《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4。

^{②⑦}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204。

^{②⑧} 裴萱：〈從人道主義到審美主義：1980年代「美學熱」的生成譜系考察〉，《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頁1-8。

^{②⑨} 裴萱：〈從人道主義到審美主義〉，頁1-8。

方式。

三、抗爭中的轉向與一致

1986年，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出版，與《詩化哲學》完成時間相近，思想卻大相逕庭。他在《拯救與逍遙》的前言中承認：「《詩化哲學》據我的『美學』碩士論文擴寫而成，但在寫論文之前，我已經對『美學』見異思遷。」^{③①}他又接著說：「『詩化哲學』的表達其實是一種尷尬：不得不在我所追尋的哲學與『專業』之間保持平衡。」^{③②}可見，《拯救與逍遙》的思想大轉，其實是劉小楓對過去的自我的批評和更新，正如甘陽所說：「小楓的《拯救與逍遙》就是要清算他自己的《詩化哲學》。」^{③②}

承接宗白華「雜糅中西、廣徵博采中體悟中國藝術的精髓和意境」，^{③③}劉小楓借中西文化的比較來支撐自己的民族性立場。宗白華注重中西比較，更傾向「從『民族性』的自我認同出發逐漸進入到更為廣闊的文化自覺中」。^{③④}《詩化哲學》的中西視野和民族性立場都與宗白華如出一轍，如劉小楓在論述叔本華時，要將他的悲劇思想與莊子（周，前369?-前286）的超脫相比較，且認為中國道家傳統的無為是更高層次的瀟灑統一；在介紹尼采的酒神精神時，也要提到魏晉時代的酒文化，評價「尼采的醉境是唯意志的擴張，晉人的醉境則是無意志的超然」。^{③⑤}他一邊借西方浪漫主義的氣勢來張揚人的心靈價值，一邊又站在民族性的根基上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華民族的優越性。這既是劉小楓對宗白華的承接，也是他在學術發展初期對民族及自我驕傲的保護。

但在《詩化哲學》中被高揚的傳統精神，在《拯救與逍遙》中被劉小楓反叛了。《拯救與逍遙》從詩人的自殺談起，討論絕境與絕境中的出路，在不以宗教神學為精神支柱的古代中國，詩人們自主地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屈原（前342-前278）是儒家風範的表率，以君子之道為生命的中心，但這完全不夠牢靠，因為儒家「從來沒有提供詢問什麼是真實可靠的價值的可能條件，不去詢問歷史王道的正當性，不去詢問歷史中的價值的超驗根據」，^{③⑥}劉小楓認為君子們崇尚的歷史王道實際上是統治者的個人取向，所以

^{③①}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

^{③②}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5。

^{③③}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頁214。

^{③④} 黃霖主編，黃念然著：《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文論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頁287。

^{③⑤} 黃霖主編，黃念然著：《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文論卷）》，頁291。

^{③⑥} 劉小楓：《詩化哲學》，頁185-186。

^{③⑦}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128。

堅信儒家思想的君子最終會自殺於「信念的毀滅」，^{③7}儒家不是絕境的出路。從歷史王道出逃的古人想投奔道家的無常和超脫，如果社會現實不足信，人們就不得不在超越世俗的天與自然或自我內心尋找答案，陶淵明（365？-427）是這條路的代表。陶淵明懷著政治絕望的「涼」心拈花微笑，士人們遁入山水自然，自得其樂，但這條被沿用千年的路向也被劉小楓否認了：「在道家精神那裏出現了一場徹底的價值顛倒，本來無價值的東西被賦予了價值，本來有價值的東西被剝奪了價值。」^{③8}那如果像曹雪芹（1715？-1763？）那樣，「以『情性』取代儒、道、釋的德性、真性、佛性」^{③9}呢？《紅樓夢》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已經給出了回答，情愛無法抵抗世間惡意的冷落和摧殘。劉小楓把討論對象後移，放到魯迅（周樹人，1881-1936）身上，用魯迅的鐵血法則繼續抗爭，用惡來反抗惡，但如果「為善和正義而作惡，結果必然是惡上加惡」。^{④0}至此，劉小楓對中國傳統的出路都試探過一次，並認為這些傳統思想都不足以應對當下的時代危機。

在向傳統尋求答案而不得後，劉小楓的研究方向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從《詩化哲學》的美學轉向了《拯救與逍遙》的神學，《詩化哲學》是他自我洗刷的對象，他在《拯救與逍遙》的前言中發出呼喚：要「走出思想的民族解放事業、回到個人生活信念問題」。^{④1}正如前文所說，《詩化哲學》的創作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賀桂梅還將此書判斷為「以個人專著的形式實際上體現了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共同關注的問題」，^{④2}劉小楓要徹底地表達個人的思想和精神，就要從對此書的反叛開始。夏中義相信，「劉小楓從《詩化》到《拯救》的轉向，是一種發軔於信念而導致的學理揚棄」。^{④3}學理的揚棄總是會受到質疑的，《拯救與逍遙》被諸多學者批評，向天淵認為劉小楓歪曲了邏輯和歷史，^{④4}高原、朱貽淵等人也紛紛批判《拯救與逍遙》，不滿劉小楓對魯迅、陶淵明等人的價值判斷。高旭東的《中西文學與哲學宗教——兼評劉小楓以基督教對中國人的歸化》^{④5}指責劉小楓以基督教精神為評價一切文化和藝術的尺度，

③7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48。

③8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184。

③9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66。

④0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62。

④1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6。

④2 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頁29-41+46。

④3 夏中義：《新潮學案——新時期文論重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頁180。

④4 向天淵：〈中西精神衝突的正解與誤解〉，頁155-165。

④5 高旭東：《中西文學與哲學宗教——兼評劉小楓以基督教對中國人的歸化》（北京：北京大學

有文化一元論的弊端。從學理上而言，劉小楓對傳統文化的評價有些嚴苛，在邏輯和史實上有不恰當之處，但若結合他的寫作目的與個人思想來看，又可理解他的選擇。夏中義認為劉小楓看重思想多於學術，他的誤判並非無力區分，而是因他太想顛覆李澤厚的「積澱說」，他「想在一個更大的思辨框架重估莊、禪，亦即他不願為莊、禪而莊、禪，而想把儒、道、釋作為民族精神譜系的整體性構成來考察」。^{④6}結合夏中義的觀點，可知劉小楓不甚在意不同精神派別間的區別，史實的正確與否也非重點所在，他的目的是傳遞一種自由的反叛精神，一種宣揚個體價值重要性的態度，對他來說，核心觀念的表達重於細枝末節的梳理，這為他招來了一定的批判，但不能否認此書影響之深遠。

《詩化哲學》既是劉小楓自我批評的對象，也是他後續學術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正如翟崇光所說，劉小楓「於1980年代初寫下的『人類學美學』『德國浪漫哲學』等文本，為他寫就《拯救與逍遙》積累了素材資源，他的『拯救』是在其『逍遙』文本的基礎上重新變換視角和立場寫成的」。^{④7}甘陽也說過：「（劉小楓）走向宗教的脈絡是很清楚的，在《詩化哲學》裏已經很清楚，因為德國浪漫派在談這個靈性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在談神性，所以在那個時候這個神的神性東西已經進入了。」^{④8}可見，《拯救與逍遙》的產生是以《詩化哲學》為基礎的，《詩化哲學》中梳理的德國浪漫哲學本身就與宗教、古希臘文化關聯密切，且這些文化也在反對啟蒙理性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劉小楓走向神學是順勢而為的選擇。另一方面，《詩化哲學》打下的思想基礎主要體現在劉小楓創作的根本態度中，《拯救與逍遙》接續了《詩化哲學》的高起點，繼續尋求人生何如的答案，劉小楓給出的回答有所變化，但他於絕望中尋求希望的信念並無改變，仍堅決拒斥虛無入侵生存的意義，姚新勇說：「劉小楓由《詩》著到《拯》著的『變』是表面的，『不變』才是內裏的，走向『神性拯救』、進而學習神學把劉小楓心理結構中理想情懷的一面發揮到了極致。」^{④9}與劉小楓關係密切的何光滬也認為《拯救與逍遙》「把形形色色的文學詩學的內容，把古今中外的哲學神學的傳統，統統拉回到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這個根基之處，予以無情的剖析和深入的討論」，^{⑤0}劉小楓探索的對象依然是人生的終極問題，他一直站在個體生存的角度，在關心自然人性

出版社，2004年）。

^{④6} 夏中義：《新潮學案》，頁203。

^{④7} 翟崇光：〈劉小楓1980年代前期「詩化美學」解讀〉，頁65-70。

^{④8}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頁215。

^{④9} 姚新勇，翟崇光：〈劉小楓學術轉向批判〉，頁37-43。

^{⑤0} 何光滬：〈「這個世界最需要愛」！——讀劉小楓《拯救與逍遙》〉，《讀書》1989年第6期（1989年4月），頁5-17。

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他的討論主旨是始終統一的。在《詩化哲學》中，科技文明與個體心靈產生衝突，帶來的是人得以自持的價值喪失，生存化為一片虛無，劉小楓嘗試跟隨西方浪漫主義哲人的腳步，用理想的詩化填補虛無，但他自知這只是在回答一些不得不面對、但又無法解決的問題。到了《拯救與逍遙》，他更多地直面了生活中的惡，此時回看中國傳統的士人理想，詩人的自殺證明人們不能從儒道文化中得到真正的出路，虛無依然是虛無，但劉小楓仍在堅持：「我已經擺明了自己的立場：拒斥任何形態的虛無主義，無論它以倡言絕對的價值虛無和價值的相對性的面貌出現，還是以倡言歷史理性主義的面貌出現。」⁵¹秉持著這樣的立場，劉小楓才極力推崇拯救而否定逍遙，他認為過度的逍遙易使人在不幸中返回到另一種非人性狀態，走向另一層面的虛無。劉小楓投身神學的舉動，恰恰是他執拗於理想主義的精神表現。且不論答案的正確與否，由此可見的是，劉小楓以理想抗擊虛無的思想本質從未改移，他始終是懷有赤子之心的真誠學者，執著地在絕境中尋找一息微光。

四、對人性價值的認可與偏移

對人性價值的肯定可謂是劉小楓永恆的學術主題，從《詩化哲學》的迷茫：「有限的、夜露銷殘般的個體生命如何尋得自身的生存意義」，⁵²到《拯救與逍遙》的獨白：「一個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業，才是小說中真正令我迷戀的事情」，⁵³再到《沉重的肉身》的求索：「當一個人生命被感受為破碎時，應該如何生活」，⁵⁴他始終懇切地關懷著個體的幸福和命運。

將美學與人生問題的解決相結合，是劉小楓直接受到宗白華影響的表現。劉小楓在懷念老師宗白華的文章中寫道：「作為美學家，宗白華的基本立場是探尋使人生的生活成為藝術品似的創造。……人生的藝術化問題在宗白華那裏，始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⁵⁵而且「宗先生最終把人生觀確立在中國的審美主義上」。⁵⁶身為宗白華的弟子，劉小楓直接繼承了這「人生的藝術化問題」和「審美主義」的討論，他對美學的討論超出了一般的學術層面，已面對人生的終極問題，詩化的對象不止是哲學，更是個人的生活本質，以《詩化哲學》為思想的起點，劉小楓的學術生涯從一開始就擁有極廣闊的視

⁵¹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444。

⁵² 劉小楓：《詩化哲學》，頁14。

⁵³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

⁵⁴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頁56。

⁵⁵ 劉小楓：〈湖畔漫步的美學老人——憶念宗白華師〉，《讀書》1988年第1期（1988年1月），頁113-120。

⁵⁶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頁100。

野和深厚的意義。

劉小楓對個人精神的關注與當時的學術風氣有關。有學者以為「80年代自由解放話語更側重在精神層面與心理層面，強調主觀世界以及思想的絕對自由而不是自由所需的各種社會條件尤其是制度條件」，^{⑤7}《詩化哲學》對人性自由的重點討論正與這有所貼合。上個世紀80年代，西方文論的引入和翻譯是知識界不可忽視的一大潮流，身為「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知識群體的一員，劉小楓的《詩化哲學》不可避免地要以中西文論的比較為重要創作方式之一，並重點介紹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尼采等存在主義學者的思想，因為「『存在主義』知識的『啟用』，則使『新時期文學』敘述找到了一個歷史依據，它預示著一個『人的文學』的誕生」，^{⑤8}而《詩化哲學》正「包含了對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歷史境遇的同情性的思考」。^{⑤9}而且，陶東風認為，普遍主體與人的自由解放是當時的主導性美學文藝學話語之一，「『主體性』、『人的自由與解放』、『人道主義』幾乎是當時的相關文章中出現得最多的術語。」^{⑥0}劉小楓的關注點與這主導性話語十分貼合，他認為，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重要的是「把個體的肉身偶在從歷史理性的囚禁中攙扶回自身的親在」，^{⑥1}這正是對解放人的主體性的宣導。在劉小楓的早期作品中，他關注的人的解放是偶然個體在茫茫社會中的自我獨立的尋求，與80年代初「人道主義討論」中群體性的「人」有所區別。如果根據李定春的觀點，「80年代初期人道主義話語對個人主義話語的壓抑和限禁也導致80年代中期以後的個人主義話語為突破這一壓抑與限禁而不斷偏激地強調抽象與普遍意義上的『個人』」，^{⑥2}那麼，劉小楓對具體個人的反覆強調、對社會和群體意識的抗拒也就有了原因。而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裏走向神學，與他認為「西方人本主義從來就沒有與神本主義斷絕過內在姻緣」^{⑥3}有重要關係。可見，在劉小楓搖擺不定的學術思想中，對人性價值的追求和肯定是不變的中心。但是，當對人性的價值肯定被作為手段來反抗社會及文學的功利性時，這價值本身就被帶上了功利性和目的性。陶東風說：「無論是普遍主體性話語、

⑤7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2期（1999年4月），頁98-106。

⑤8 程光燁：〈一個被重構的「西方」——從「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看八十年代的知識範式〉，《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2007年7月），頁42-47。

⑤9 程光燁：〈一個被重構的「西方」〉，頁42-47。

⑥0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頁98-106。

⑥1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頁264。

⑥2 李定春：〈對「個人」的刻意規避及其後果——個人主義視角下的1980年代「人道主義討論」〉，《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2012年7月），頁155-160。

⑥3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頁265。

人的自由解放承諾，還是學科自主性訴求，都與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緊密相關，它們本質上依然帶有強烈的功利性、意識形態性乃至於政治性。」⁶⁴在劉小楓的幾部著作中，他總是或強烈或痛苦地質問和強調人的主體意義，這質問是有隱含卻明顯的對象的，不論這表達的效果如何，如果對人性的認可是為了反抗而認可，那這反抗又恰恰落入了功利的窠臼。

值得一提的是，在強調個體生存的觀念下，劉小楓有意無意地降低了社會的群體規範制度的作用，趙良杰認為，劉小楓忽視了那些「以人與世界關係為核心的活動（認知、實踐和信仰）的公共性意義」，⁶⁵以至於「價值現象學的主體哲學背景使其對現代性問題和『中國問題』的診斷出現了嚴重偏差，最終取消了現代性的規範基礎及其人義論價值立場」。⁶⁶但關鍵是，劉小楓未必真的完全忽視了人與世界的關聯。事實上，劉小楓十分重視詩人與民族的關係，他說：「詩人的信念是以民族的基本信念為依據的」，⁶⁷詩人要為世界提供意義，而這意義是無法脫離民族精神獨立存在的。汪暉認為《拯救與逍遙》是「以基督教倫理為依據，提出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價值問題和思想問題」，⁶⁸肯定了劉小楓整體上對中國思想的關懷。姚新勇更直接指出：「劉小楓於1980年代末走進『神學』研究，但他是想用『宗教』來解決中國問題，而不是為安頓自己的心靈。劉小楓開始作『神學』研究後，他心理結構中集體性、國家情懷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來。」⁶⁹若說《詩化哲學》集中關注了個人生存的問題，那《拯救與逍遙》實際上是擴大了「人」的範圍，從「個人」發展到了「人類」，《詩化哲學》想解決如何生成個人價值的問題，而《拯救與逍遙》則是討論如何讓基督教思想和倫理價值有益於中國社會。

隨著視角的變化，劉小楓的研究重心也逐漸變化，他的研究總是在為解決人類困境而努力，而在劉小楓眼裏，現代性帶來的種種問題正是當下最重要的困境之一。劉小楓討論的人性價值早已不只停留在偶然個體的層面上，近年來，反而更多地轉向人類群體的生活方式，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成為他新的研究切入點和著力點。首先，劉小楓不再極力將文化與政治切割乾淨，相反，在2005年的第二屆開放時代論壇的會議上，他主

⁶⁴ 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頁98-106。

⁶⁵ 趙良杰：〈價值現象學的迷失〉，頁150-160。

⁶⁶ 趙良杰：〈價值現象學的迷失〉，頁150-160。

⁶⁷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86。

⁶⁸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75。

⁶⁹ 姚新勇，翟崇光：〈劉小楓學術轉向批判〉，頁37-43。

張文化和政治是一個共同體，政治自主是學術自主的基礎，^{⑦⑩}而大學市場化侵入了文史哲等學科的內在肌理，政治上的現代化是此弊端形成的根本原因。^{⑦⑪}他依然關注詩，卻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的《詩學》。^{⑦⑫}其次，劉小楓關注的自主性問題從個體自主性轉向了民族自主性，劉小楓學術的底層支柱依然是他對生命的熱愛，但討論的方向已從個體在龐大社會下的生存轉向社會整體如何合理而合情地運行，且範圍也已從個人的精神世界轉到現實中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發展與交往。如劉小楓於今年十月發表的〈重審斯賓塞的有機體政治論〉，^{⑦⑬}便自述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當代「白左倫理」的依據，可見，他的研究始終與時代同行。在此情況下，不妨認為劉小楓未來也會繼續加強哲學、史學與政治學等多種學科的融合，運用理論深入剖析社會現實問題，並且，個體生命和人類依然會是他的討論核心。

不可否認的是，在一次次抵抗虛無的嘗試中，劉小楓的學理邏輯和表達方式有過偏差，從《詩化哲學》的個體自主立場到如今關注的民族自主性，關於他的批評和爭議從未停止，他鮮明的個性和張揚的表達也容易招致誤會。不過，劉小楓從未在思想交鋒的過程中不戰而退，他自己多次參與並推動學術熱潮，與其他學者展開論辯。對劉小楓著作的理解往往受時代和讀者影響頗深，劉洪霞〈「拯救」八十年代知識立場的使命——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於八十年代的意義〉^{⑦⑭}就梳理了多位學者對劉小楓思想的不同看法，但若要真正體會到他的深層思想，不能囿於文字表面的淺層含義，更要思索他創作時的本意和精神傳遞的根本目的。《詩化哲學》高度肯定個體意義，是為了擺脫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風氣；《拯救與逍遙》推翻傳統文化的至高地位，是希望將關注點轉移到人類本身，想為迷茫的人們尋求一個新支點；劉小楓近年來對國際局勢和社會現實問題的針對性討論，並非是開拓政治道路的嘗試，他真正關注的對象永遠只有人，不論這人是個體抑或群體。劉小楓的學術發展和轉向都以《詩化哲學》為基礎，其中愛和人性的核心被他堅定地發展了下去，縱然人性價值的定義範圍有所變化，但這根本的基調是不變

⑦⑩ 劉小楓，蘇國勳：〈中國學術的文化自主性〉，《開放時代》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4-53。

⑦⑪ 劉小楓：〈當今教育狀況的幾點觀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2006年3月），頁1-3+123。

⑦⑫ 劉小楓：〈《詩術》的倫理——政治哲學意涵〉，《現代哲學》2012年第5期（2012年9月），頁66-71+85。

⑦⑬ 劉小楓：〈重審斯賓塞的有機體政治論〉，《人文雜誌》2023年第10期（2023年10月），頁75-85。

⑦⑭ 劉洪霞：〈「拯救」八十年代知識立場的使命——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於八十年代的意義〉，頁46-50。

的，他的轉變實則是為了更進一步地探索人性價值的實現方式。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劉小楓對道路的選擇大不相同，但他秉持人性立場、肯定愛和人的意義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

五、結語

《詩化哲學》在劉小楓的學術生涯中有著重要地位。在劉小楓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它既是以人的終極問題為學術研究核心的起點，又是其後批評討論的對象，成為他後期思想調適的起點和參照。《詩化哲學》是個人取向、師生傳承、學界風氣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的成果，可視為劉小楓直面社會文明帶來的異化，懷揣理想主義的赤子之情，打出了反抗社會潮流的旗幟。

張志揚認為劉小楓主要有三次學術轉向：哲學向神學、神學向政治哲學、政治哲學向古典經學，^⑦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社會現實和群體生活。劉小楓轉向神學，虛無縹緲的神並非真實目的，他是在尋求新的可以安慰人的事物，當大受稱讚的人道主義都無法拯救人的時候，或許神能給予新的意義，使人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他再走向貌似降低一級的政治哲學，實際上是人得以追求高妙事物的前提，當社會政治問題變成社會中最根本的問題時，人文必要與其結合，才能產生更令人安心的價值；而當生活一度被降解為技術和欲望的單純鏈接時，不滿此發展事態的劉小楓又再次轉向，在新的方向為混亂的中國學術尋找一個可靠的落腳點。前後數十年創作間學術思想的變與不變，見證著劉小楓這一代知識份子直面危機挑戰、勇於責任承擔的風範和在堅守中自我革新的學術使命。

^⑦ 張志揚：〈揀盡寒枝不肯棲……〉，《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11期（2007年11月），頁118-122。